

## 重論《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之底本\*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e Text of *Yuzhu baodian* in the *Guyi congshu*

富嘉吟

《玉燭寶典》乃是隋人杜臺卿以節令為主題編纂的一部類書，原書在中土早已亡佚，日本尚存鈔本若干，光緒年間經由《古逸叢書》本的刊行而回傳大陸。根據《古逸叢書》書前題字，此書為「影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不禁令人聯想起赫赫有名的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所藏舊鈔本。而隨著尊經閣本的影印出版<sup>1</sup>，《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在文本價值上似乎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然而，楊守敬在刊行當時究竟採用了何種底本，則是《古逸叢書》研究乃至清末民初日中學術交流史的一個有趣的話題。

早年以吉川幸次郎為代表的日本學者，認為《古逸叢書》本的底本為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為其前身之一）所藏卷子本的轉寫本，這一觀點長久以來為一般研究者廣泛引用。近年來，大陸有學者根據楊守敬留下的筆談記錄，對此觀點進行了修正。然而，由於相關材料多出於輾轉引述，造成了許多誤解，反而使問題變得更為繁雜。本文即在重新梳理《玉燭寶典》現存諸本的基礎上，重新探討《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之底本問題。

以下，僅參照吉川幸次郎（1943）<sup>2</sup>、今江廣道（1977）<sup>3</sup>、渡部武（1986）<sup>4</sup>、石川三佐男（2005）<sup>5</sup>諸人成果，並綜合新見資料，整理日本國內現存《玉燭寶典》留存情況如下<sup>6</sup>：

\*本研究係 JSPS 科研費（JP19K13074）階段性成果。

<sup>1</sup>即《尊經閣叢刊》（侯爵前田家育德財團，1943 年）本。

<sup>2</sup>《尊經閣叢刊》本所附「解題」，後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7 卷（筑摩書房，1968 年）。

<sup>3</sup>今江廣道《京大古文書室藏「舊抄本經書」をめぐって》，《國學院雜誌》第 80 卷第 11 號，1979 年。後收入《前田本『玉燭寶典』紙背文書とその研究》（今江廣道編，續群書類從完成會，2002 年）。

<sup>4</sup>渡部武《「四民月令」輯本稿》，《東海大學紀要 文學部》第 45 輯，1986 年。

<sup>5</sup>石川三佐男《古逸叢書の白眉『玉燭寶典』について：近年の學術情報、卷九の行方など》，《秋田中國學會 50 周年記念論集》所收，2005 年。

<sup>6</sup>不包括自大陸流傳至日本的鈔本，如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王先謙高足蘇輿所作鈔本。

## 1. 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所藏鈔本二種

### 1.1 卷子本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尊經閣本」）

此書乃加賀藩前田侯舊藏十四世紀中期寫本，一般認為是現存《玉燭寶典》最古老的鈔本。1943年作為《尊經閣叢刊》之一種，由侯爵前田家育德財團影印並附吉川幸次郎所作《解題》<sup>7</sup>。次年年末即遭遇東京大空襲，因而未能廣為流佈<sup>8</sup>。

尊經閣本卷末所有識語如下：

卷五：“嘉保三年六月七日書寫了 竝校畢”

卷六：“貞和四年八月八日 書寫畢”

嘉保三年（1096）與貞和四年（1348）一在平安時代，一在南北朝時代，二者相去近三百年；而尊經閣本紙背所鈔文書又有「貞和」及相近時期「建武」、「曆應」諸年號。因此，吉川幸次郎判斷尊經閣本實為貞和鈔本，嘉保三年的識語乃是鈔寫之時保留下的舊本痕跡<sup>9</sup>。

### 1.2 鈔本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尊經閣別本」）

根據渡部武所見，乃是尊經閣本所鈔錄的副本<sup>10</sup>。

## 2. 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卷子本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佐伯本」）

佐伯本乃佐伯藩舊藏鈔本，江戶末期進獻於幕府並最終歸於宮內廳書陵部。此本即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解題叢書》本，國書刊行會，1916年）卷五「子部下・類書類」所著錄楓山官庫藏貞和四年鈔本「玉燭寶典十二卷」，僅錄解題如下：

隋著作郎杜臺卿撰，缺第九一卷。每册末有“貞和四年某月某日校合畢，面山叟”記。五卷末有“嘉保三年六月七日書寫竝校畢”舊跋。按：此書元明諸家書目不載之，則彼土蚤已亡佚耳。此本為佐伯毛利氏獻本之一，聞加賀侯家藏卷子足本，未見。

佐伯本具體的鈔寫年代不明<sup>11</sup>，然而根據下文所述以佐伯本為底本的昌平鬻本的問世，可知其出現絕不晚於文化二年（1805），即佐伯藩第八代藩主、佐伯文庫創立者

<sup>7</sup> 吉川氏受邀作《解題》一事，參見《全集》第7卷「自跋」（頁596）。

<sup>8</sup> 今江廣道《前田本『玉燭寶典』紙背文書とその研究》「序にかえて」，頁3。

<sup>9</sup> 《吉川幸次郎全集》本「解題」，頁556。

<sup>10</sup> 渡部武《「四民月令」輯本稿》，頁128。

<sup>11</sup> 吉川幸次郎以為毛利高翰之時所影寫，不知其論據何在。

毛利高標去世四年以內。這一推測，與佐伯本書中「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這一印文的存在相呼應<sup>12</sup>。文政十一年（1828），佐伯藩第十代藩主毛利高翰將大量珍籍古本進獻幕府。當時所作獻書目如《佐伯毛利侯獻納書目錄》（國立公文書館藏寫本）之中著錄有《玉燭寶典》六冊，佐伯本便是由此入藏楓山文庫並最終歸於宮內廳書陵部架上。

佐伯本一般被視為尊經閣本的傳鈔本，吉川幸次郎曾經比對兩本所收識語，指出其間存在許多不同之處，僅條列如下。

卷二：尊經閣本：無識語

佐伯本：“貞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校了 面山叟”<sup>13</sup>

卷五：尊經閣本：“嘉保三年六月七日書寫了 竝校畢”

佐伯本：“嘉保三年六月七日書寫了 竝校畢”

卷六：尊經閣本：“貞和四年八月八日 書寫畢”

佐伯本：“貞和四年八月八日”

卷八：尊經閣本：無識語

佐伯本：“貞和四年十月十六日校合了 面山叟”

除卷五以外，尊經閣本與佐伯本的識語存在不少出入。特別是兩處涉及鈔寫者「面山叟」的關鍵部分，尊經閣本居然全無蹤跡。遺憾的是，吉川幸次郎並未對此問題做出合理解釋，徑下結論以為佐伯本自尊經閣本鈔出，令人不得其解。

吉川幸次郎的判斷或許出自學者的直覺，而幸運的是，尊經閣本兩處消失的題識竟然尚存於天壤。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古文書學者今江廣道檢閱京都大學文學部古文書室所藏典籍，在壬生官務家舊藏「舊抄本經書」之中發現了割裂自尊經閣本而來的“貞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校了 面山叟”、“貞和四年十月十六日校合了 面山叟”兩段識語。今江氏並進一步考證，所謂「面山叟」即室町幕府時期活躍於世的二階堂道本，尊經閣本乃是其體察足利直義之意所鈔。尊經閣本消失的兩段關於「面山叟」的識語，則極有可能是足利直義在觀應之亂失勢以後，出於政治上的避諱而人為截去的。而完成於江戶時代的佐伯本所以得以保留尊經閣本早期未經割裂的樣貌，則大概是由於其並非徑直鈔錄尊經閣本而來，二者之間還存在若干傳鈔本<sup>14</sup>。這一推論足以解釋為何佐伯本在保留尊經閣本完整的識語的同時，又存在不少明顯的差異，如卷六識語少“書寫畢”三字，卷六、七、十一內題「寶典」下多一“記”字，以及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殘缺。以上三點，也是用來判斷後出鈔本是否源自佐

<sup>12</sup> 梅木幸吉《佐伯文庫の研究》（增補訂正版），梅木幸吉，1989年，頁170。

<sup>13</sup> 吉川幸次郎《解題》錄此段識語於卷三末尾，作“貞和五年四月十三日 面山叟”，字句出入或是偶然誤記。而識語的移動則與下文所論楊氏校正本同，不知二者間有何關聯。

<sup>14</sup> 參見今江廣道《京大古文書室藏「舊抄本經書」をめぐる》，《國學院雜誌》第80卷第11號，1979年，後收入《前田本《玉燭寶典》紙背文書とその研究》（續群書類從完成會，2002年）。

伯本抑或尊經閣完本的重要標誌。

### 3. 國立公文書館所藏寫本二種

#### 3.1 昌平坂學問所舊藏寫本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昌平鬻本」）

國立公文書館有昌平坂學問所舊藏寫本一種，其卷末識語如下：

卷二：“貞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校了 面山叟”

卷五：“嘉保三年六月七日書寫 竝校畢”

卷六：“貞和四年八月八日”

卷八：“貞和四年十月十六日校合了 面山叟”

昌平鬻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卷二以下字數多有動搖，大致在十四字至十八字之間，其行款同於佐伯本；四處識語完整，卷六識語無“書寫畢”三字；卷六、七、十一內題「寶典」下多一“記”字；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殘缺。以上種種證據，皆足以證明其源出自佐伯本而尊經閣完本、更非割裂以後的尊經閣本。而昌平鬻本卷六題下突兀出現“貞和三年/十一月”七字，實質是由於佐伯本祖本在鈔寫尊經閣本之時，誤將紙背文書中的紀年鈔入所致。

除佐伯本原有識語之外，昌平鬻本卷二末尾有“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豬飼傑、橫山樵同校畢，三月五日”；卷十二末尾有“化二癸亥暮春，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全校”兩處朱筆識語；全書卷末又有「文化乙丑」（二年）鈔寫完畢之時所捺朱印<sup>15</sup>。同時，書中天頭處還存在大量朱筆校異，與校勘者之一依田利用（初名依田利和）<sup>16</sup>所撰《玉燭寶典攷證》（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大量重合，後者應當是依田利用在這次校勘工作基礎上完成的。

昌平鬻本中的朱筆校記，大多是為訂正佐伯本原有誤字而作；也有少數情況，昌平鬻本鈔寫錯誤，而以朱筆校記還原佐伯本原貌<sup>17</sup>；而底本有蟲蛀之類磨損漫漶，更是以朱筆勾勒缺損處輪廓，顯示出依田利用諸人極為謹慎的學術姿態。書中又有少量墨筆校記，乃是抄錄自佐伯本原有墨筆校記；也有根據佐伯本墨筆校記直接訂正文本的情況<sup>18</sup>。總體看來，昌平鬻本嚴格遵循佐伯本文本，盡力復原佐伯本風貌，乃是一個質量極佳的鈔本。

<sup>15</sup>昌平坂學問所舊藏典籍之中常見冊尾有一種年號、干支組合朱印，乃是為了標記新購入、新鈔寫或新印行書籍而使用的入藏印，參見《內閣文庫藏書印譜（改訂增補版）》（國立公文書館，1981年，頁17）。

<sup>16</sup>山本巖《依田利用小傳》、《宇都宮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42號第1部，1992年，頁38。

<sup>17</sup>如佐伯本序文“商湯”二字，昌平鬻本作“高湯”，朱筆訂正作“商”。

<sup>18</sup>如佐伯本序文“自蓋陔”三字，“蓋”字墨筆旁書作“孟”，昌平鬻本則徑作“自孟陔”。

根據山本巖氏考證，包括依田利用在內，文化二年參與昌平黌本《玉燭寶典》校正的五人當時皆擔任“學問所出役”一職，因此，《玉燭寶典》的鈔寫、校訂工作並非由此五人獨立發起，而是來自大學頭林述齋的授意。這一時期正值《佚存叢書》的出版階段，《玉燭寶典》恐怕本在《佚存叢書》的出版計劃之中，不知因為何種原因未能付諸刊行<sup>19</sup>。值得一提的是，依田利用另有《古佚窺斑》（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一書，書中根據傳世文獻大量輯佚古書，其所採錄文獻除《玉燭寶典》以外，還包括《樂書要錄》、《五行大義》、《泰軒易傳》、《古本蒙求》、《臣軌》五種收錄於《佚存叢書》之中的典籍，種種蛛絲馬跡，或可為山本巖氏的推測作一旁證。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二年佐伯本尚未進獻幕府書庫，或許是因為《佚存叢書》的刊行而特意調至江戶以供鈔寫。而幾乎在同一時期的文化五年（1808），昌平坂學問所訪得高山寺藏宋本《齊民要術》殘卷，林述齋囑託學問所吏員小林彝繕寫竝返還原處，當時所作鈔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同樣附有依田利用跋文。兩次借閱鈔寫的背後，可以令人窺見與《佚存叢書》之間的隱約關聯。而昌平黌本雖然最終未能作為《佚存叢書》刊行，如下文所述，幕末至明治年間流傳於世的《玉燭寶典》多是源自此本，其影響不可不謂深遠。

### 3.2 水野忠央舊藏寫本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水野本」）

水野忠央為幕末時期紀伊新宮藩藩主，其所編纂《丹鶴叢書》乃是以丹鶴書院所藏日本國史、國文學、醫學類為主體刊刻而成，與同一時期昌平坂學問所官版漢籍的刊刻相輝映<sup>20</sup>。水野本保留的舊本識語僅僅有卷六一處，作“貞和四年八月八日書寫畢”，同時，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文本完整，可知其乃是自尊經閣完本或別種鈔本轉錄而來。在江戶時期流傳於世的諸多鈔本之中，水野本是僅有的不屬於佐伯本系統的本子。

## 4.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所藏寫本二種及拔萃本一種

### 4.1 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南葵甲本」）

卷末有江戶後期書商達磨屋五一「江戶四日市古今珍書儉達摩屋五一」印，卷首又有幕末紀州藩學者小中村清矩「やすむろ」印及「紀伊德川/南葵文庫」印，可知此本先後為達磨屋五一、小中村清矩所藏，最終歸於南葵文庫<sup>21</sup>。卷三末尾有“安

<sup>19</sup>山本巖《依田利用小傳》，頁41。

<sup>20</sup>參見川瀨一馬《「丹鶴叢書」に就いて》，《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所收，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3年。

<sup>21</sup>參見佐藤賢一《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所藏「南葵文庫」について：その來歴と今後の展望に向けて》，《大學圖書館研究》2005年第74號。

政四年十月四日一校了 小梅里草澤源良”，卷十二末尾有“安政五年七月□□□□□□書寫□了”<sup>22</sup>識語。鈔寫者草澤源良，其生平不詳。

比對昌平鬻本可知，南葵甲本保留了佐伯本一系四種識語中除卷八以外的三種，且卷六識語同樣無“書寫畢”三字；卷六題下誤入“貞和三年/十一月”七字；卷六、七、十一內題多一“記”字；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殘缺。同時，卷二末尾有依田利用諸人識語；書中朱筆校記也與昌平鬻本大量重合。綜合以上種種線索，南葵甲本應當是安政四至五年間，由草澤源良鈔寫自昌平鬻本或其傳鈔本無疑。

#### 4.2 三卷（第十至十二殘卷）（以下簡稱「南葵乙本」）

卷首有小中村清矩「陽春廬記」及「紀伊德川/南葵文庫」印。根據卷十一內題多一“記”字，及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殘缺，可知南葵乙本同樣來自佐伯本一系。其行款同於昌平鬻本，但是如實保留了原本誤字、而未依照依田利用諸人校記擅改。

南葵乙本與南葵甲本同樣出自昌平鬻本子系統，同樣經小中村清矩之手入藏南葵文庫。遺憾的是，現存《小中村清矩日記》（大沼宜規編著，汲古書院，2010年）之中未能留下相關記錄。

#### 4.3 海保元備拔萃鈔本（以下簡稱海保本）

此本有「海保先生自所書錄」、「篁邨島田氏家藏圖書」、「島田氏雙桂樓收藏」、「南葵文庫」印，乃是幕末漢學家海保元備鈔本，後歸於弟子島田篁邨，最終移入南葵文庫。

全書字跡潦草，摘錄原書亦無一定之規，應當是爲了私人閱覽隨意鈔寫而成。書中刪落了所有用以判斷底本來源的重要信息，然而比對昌平鬻本，其文本似乎根據依田利用諸人校語作了訂正，應當是來自昌平鬻本或其傳鈔本。海保本鈔寫時間不明，不知是否與其參與《經籍訪古志》編纂之事相前後。

### 5.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狩野文庫所藏寫本（殘八卷）（以下簡稱「狩野本」）

此本爲狩野文庫舊藏。根據書中所有依田利用諸人識語可知，狩野本同樣出自昌平鬻本。其風貌與昌平鬻本極爲近似，詳細過錄朱筆校記，乃是又一質量上乘的鈔本。

---

<sup>22</sup>此處字跡潦草，難以識讀。

## 6. 專修大學圖書館所藏寫本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森氏本」）

此本為森立之、約之父子於安政年間所作合校本，卷首有「東京溜池靈南街第六號讀杜艸堂主人寺田盛業印記」朱印，為寺田望南舊藏。農史學者渡部武最早根據《山本書店古書目錄》第29號（1980年）所刊書影，揭出森氏本的存在。森氏本其後大約經山本書店入藏專修大學圖書館，石川三佐男便是在同校訪得此書。

森氏本行款同於佐伯本、昌平鬻本；保留舊鈔本除卷八以外三處識語，卷六識語無“書寫畢”三字；卷六、七、十一內題「寶典」下多一“記”字；卷六題下同樣誤入“貞和三年/十一月”七字；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殘缺。卷二末尾又有昌平鬻本“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豬飼傑、橫山樵同校畢，三月五日”識語，可知森氏本來自昌平鬻本無疑<sup>23</sup>。全書鈔寫精美，在繼承昌平鬻本校記的同時作了不少補充，除依據現存典籍對勘以外，還包括關於異體字的判定、是否存在整葉脫落的討論等等，可謂頗有價值。

安政二年正值森立之所參與的《經籍訪古志》初稿本完成之時，其後安政四年，森氏父子又鈔寫《經籍訪古志》一過<sup>24</sup>。森氏本或許便是同一時期順帶抄錄、校訂而成的。卷三末尾又有森約之於慶應丙寅（二年，1866）補筆曰：“篇首五頁，我藩友武田小藤太所謄也。”

## 7. 慶應義塾大學所藏寫本十一卷（闕第九卷）（以下簡稱「綠靜堂本」）

此本有杉原心齋（名直養）「綠靜堂圖書章」印，卷末有跋文「書玉燭寶典後」，僅錄其來歷相關部分如下：

此本佐伯侯家藏貯，係所影寫貞和四年戊子古鈔本，間或廁用武后制字，知當時所流傳於我也。貞和舊鈔本，今不詳其在否。惜蛀殘剝蝕之餘，字畫多闕失，而謄寫之不謹、謬誤不可讀者亦匪尠。今無別本可以勘對校補，且第九卷缺焉，為可憾矣。顧隋唐古笈之罕傳于世者，斷簡零策，尚在所宜珍，況乎佚於彼之久、而獨存於我者。雖非完帙，亦洵可葆□。因謄鈔以搜架焉。若其闕誤不可讀，一仍其舊，不敢妄補綴改之，故俟異日有所攷云。

文化癸酉清明前一日

石原增嶋固元恆甫識

「增嶋固」即昌平坂學問所漢學家增島蘭園（別號石原愚者），跋文與正文字跡一致，可知此本乃蘭園於文化十年（1813）所錄，其後歸於綠靜堂主人杉原心齋。蘭園與

<sup>23</sup>可惜的是，石川氏似乎並未調查過昌平鬻本的具體內容，因此不會察覺兩本之間存在的關聯。

<sup>24</sup>長澤規矩也《「經籍訪古志」考》，《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2卷，汲古書院，1985年，頁167、196。

依田利用、杉原心齋活躍於同一時代<sup>25</sup>，其人長於本草曆法，有《夏小正校注》<sup>26</sup>傳世；所著《惜分居筭記》（國立公文書館藏寫本）之中，又多論漢籍版本之事。《玉燭寶典》中保存了包括《夏小正》在內許多重要的曆法農學資料，這應該便是蘭園特意鈔寫此書的原因。

根據蘭園識語，綠靜堂本似乎是直接根據佐伯本鈔寫而來。然而比對昌平鬻本可知，綠靜堂本正文文本明顯根據依田利用諸人的校記進行了修訂，同樣應當歸於昌平鬻本這一子系統之中。書中天頭又有「直養」所作校語一二，則是出自杉原心齋之手。

如上所述，雖然尊經閣本無疑是《玉燭寶典》諸本之源流，幕末至明治時期的幾十年間，漢學家之間普遍傳言加賀藩前田氏藏有某種足本《玉燭寶典》，然而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得以一睹其風姿。增島蘭園在鈔寫《玉燭寶典》之時，“貞和舊鈔本，今不詳其在否”；林述齋門下松崎慊堂所作日記《慊堂日曆》（《松崎慊堂全集》所收，冬至書房，1988年）天保十年（1839）八月十八日中，也僅僅提及傳聞中所謂“加州侯藏足本”；同樣，參與《經籍訪古志》編纂的諸學者，也不無遺憾地表示“聞加賀侯家藏卷子足本，未見”；其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民友社，1905年）著錄《玉燭寶典》，則稱“聞侯爵前田氏又藏足本，惜未見”。直至昭和初年文庫建成以前，恐怕竝無幾人有幸一睹尊經閣本之真面目。

而與之相對，佐伯本在鈔寫年代上雖然遠遠晚於前者，然而憑藉昌平鬻本為中介衍生出大量傳鈔本，反而使得其超越尊經閣本而成為幕末時期流傳最廣的本子。而作為《佚存叢書》刊行的準備，昌平鬻本的鈔寫引起了同時期不少學者的關注，使得《玉燭寶典》在幕末至明治時期的日本書誌學家之間聲名日重，當時便有不少學者在著述之中引用此書<sup>27</sup>。如此口口相傳至楊守敬訪書之時，林述齋在《佚存叢書》未盡的事業，終將等待《古逸叢書》來完成。

在明治年間流傳於世的眾多鈔本之中，楊守敬最終得以刊刻入《古逸叢書》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本子。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最早見於島田翰筆下。明治三十年（1897），島田翰接受田中光顯之命，參與宮內省圖書寮善本古籍的整理工作，大概便是在此時得見佐伯本真跡。後來寫作《古文舊書考》，卷一「玉燭寶典」條對於《古逸叢書》本的底本做出了如下敘述：

是書，黎氏《古逸叢書》本，以影錄祕府貞和鈔本為藍本（貞和鈔本，德川氏時，佐伯侯毛利高翰所獻，鈔手極精），而卷第九，則屬闕逸。

<sup>25</sup>如天保十三年（1842）《東照宮誕辰祝文》為增島蘭園、依田利用、杉原心齋諸人所獻詩文，參見町泉壽郎、清水信子《資料紹介：芳野金陵舊藏資料目錄（稿）》，《日本漢文學研究》，第10號，2015年，頁204。

<sup>26</sup>1927年收入《崇文叢書》第1輯第49、50冊（崇文院）。

<sup>27</sup>新美寬《玉燭寶典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13冊第3分，1943年，頁95-96。



這一結論長期爲吉川幸次郎在內的學者所沿襲。

近十年來，學者往往引用楊守敬《清客筆話》（《楊守敬集》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997年）中與森立之對話如下：

卷一：翌日三月廿九日<sup>28</sup>

楊：……又貴邦古書爲我國所佚者，如《姓解》、《史略》、《玉篇》殘本、《玉燭寶典》，皆欲刻之。尤煩先生爲校勘。可乎？

楊：……高氏《史略》，再《姓解》、《史略》、《玉燭寶典》等書，如有抄本，弟願得之。

《玉燭寶典》（森註：椴齋校本，出以示之。）

楊：貴邦所有皆缺一卷乎？

森：《寶典》原本一卷缺，餘所藏本，椴齋舊藏，同人以朱筆校正者也。

楊：此似影抄，何以有誤字？

森：原卷則唐人傳來舊抄本也，故往往有訛字。其訛字亦一一有所原，不能容易改正。是宋版已前之抄本。可貴重，可貴重。

……

森：《玉燭寶典》，世上《寶典》皆以此本爲原。

楊：守敬不敢奪所愛。但古書今日不刻，他日恐又失，故欲借抄刻之耳。先生不欲此書刻乎？小生亦不取此書到家中，即煩先生屬寫工而抄之上木，可乎？

森：幸有巧手，急速可令寫。

楊：所有《玉燭寶典》，祈屬工鈔之爲感。

卷二：七月廿一日

森：《玉燭寶典》書寫半成，本月內可全成也。

楊：此即椴齋所倩書手抄之者乎？我將刻之。

森：逸於彼存於我之一書也。不可不刻也。

楊：又有《史略》、《姓解》，弟皆屬人影抄之，皆欲刻之。此《玉燭寶典》想是從原書影抄而出，可以上木。此新抄則不可上木。

森：原本椴翁所校。然其寫手不精工，故翁以朱傍書。今以其朱書寫之，則新寫本爲最正。不及校于原本也。且吾又一校，欲以正之也。何如？

楊：是誠然。然此抄手似不如椴齋本。

森：再與原本爲君一校則可矣。

卷四：辛巳八月二日楊守敬來訪

楊：《玉燭寶典》誤字甚多，椴齋所校十之二三耳。若以《太平御覽》及《禮月令》鄭注、蔡氏《月令》等書校之，其誤字當有五六也。僕僅校三四葉，已改其誤字數十。

<sup>28</sup>根據上下文，當爲明治十四年（1881）。

森：我輩以有誤字本爲貴。若其誤字一目而可知，知而後說立，說立而後校注成。別作無一誤之定本則可，不得以古本爲誤本也。是我家之讀法也。

卷六：壬午八月己未

借《玉燭寶典》、《儀禮注》抄本。楊惺吾立 辛巳七月初四日<sup>29</sup>

這段文字詳細記載了楊守敬拜訪森立之竝請求其轉讓《玉燭寶典》鈔本的始末，有學者便以此判定《古逸叢書》底本即森氏本<sup>30</sup>。然而，森氏本完成在安政年間，至楊守敬赴日之時已經二十餘年。故而有後來又有學者訂正此說，以爲森立之竝未對楊守敬言及森氏本的存在，其所出示的則是「榭齋校本」無疑<sup>31</sup>。榭齋校本不知是否尚存天壤，其始末則見於前引松崎慊堂所作《慊堂日曆》天保十年八月十八日：

玉燭寶典、十二卷、榭齋本寫昌平本、原在紅□齋<sup>32</sup>。昌平本寫加州侯藏足本。佐伯本缺九月一章。

狩谷榭齋故去以後，其藏書由摯友松崎慊堂負責整理、轉賣等等善後事宜。天保十年距離榭齋辭世已經四年，這筆記錄或許便是慊堂整理其藏書所得。榭齋舊藏其後散見於幕末書誌學家架上，其中不少歸於森立之所有<sup>33</sup>。

根據慊堂記載，狩谷榭齋有《玉燭寶典》鈔本一部，來自「昌平本」（當即昌平鬻本），這一判斷不知是自榭齋本人之口得知，還是因爲校本保留了依田利用諸人識語。然而慊堂描述昌平鬻本來自「加州侯藏足本」（即尊經閣本），則恐怕是因爲其既未能親見尊經閣本、又未注意到榭齋校本缺卷而造成的誤判。

作爲江戶後期最爲傑出的書誌學家，狩谷榭齋對於古籍珍本有著極爲熱切的嗜好。雖然以其町人學者的身份未必能輕易見到幕府祕藏，然而榭齋往來諸人之中，不乏與官家關係密切者，如近藤守重曾爲其借閱楓山文庫所藏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sup>34</sup>，松崎慊堂則曾爲其求取佐伯藩所藏淳熙本《集韻》<sup>35</sup>。榭齋得以鈔寫昌平鬻本《玉燭寶典》，或許有諸位友人斡旋而未可知。遺憾的是，現存狩谷榭齋《日本見在書目證注稿》（《覆刻日本古典全集》所收《狩谷榭齋全集》本，神田喜一郎校訂，現代思潮社，1978年）「玉燭寶典」條下，竝未留下更多有效的信息。

楊守敬見到榭齋校本後，雖然對其中的誤字多有不滿，還是即刻請求森立之委

<sup>29</sup> 此段文字以附箋形式留存。

<sup>30</sup> 崔富章、朱新林《〈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底本辨析》，《文獻》2009年第3期。

<sup>31</sup> 參見任勇勝《〈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底本辨析獻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S2期。

<sup>32</sup> 「紅□齋」當即佐伯藩毛利高標之「紅粟齋」，而下文又稱「昌平本寫加州侯藏足本」，前後齟齬。《日曆》原本有不少難以辨識之處，或是翻刻之時誤讀，待考。

<sup>33</sup> 參見川瀨一馬《森立之・約之父子》，《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所收，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3年，頁813。

<sup>34</sup> 參見川瀨一馬《狩谷榭齋の業績》，《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所收，頁720。

<sup>35</sup> 《慊堂日曆》文政九年（1826）八月廿六日：“《集韻》宋本，佐伯侯書庫，當託冠山假之求古樓。”

託鈔手鈔出一本。其後七月初四日，楊守敬自森氏處借得一《玉燭寶典》鈔本；又十七日即七月廿一日，楊守敬再次造訪森氏，得知“《玉燭寶典》書寫半成，本月內可全成也”，並再次確認其為楳齋校本。這不禁令人懷疑，楊守敬七月初所借得的並非楳齋校本，或許便是上述校正於安政年間的森氏本<sup>36</sup>。

由於森氏為楊守敬所作新鈔本根據楳齋校本的朱筆校記做了改動，故而楊守敬又提出希望徑直以楳齋校本上版。而根據森立之的解釋，楳齋的朱筆校記是在發覺鈔手不精以後，又從原本（當即昌平鬻本）校訂而得。而其下八月二日森立之的話則更可以證明，楳齋的校記並非根據傳世典籍妄改舊本，而是僅僅將誤鈔之處改正而已。

臺灣故宮博物院有楊守敬觀海堂舊藏江戶末期《玉燭寶典》鈔本一部（以下簡稱觀海堂本），書中有「星吾海外訪得祕笈」、「宜都楊氏藏書記」、「飛青閣藏書印」、「楊守敬印」四種印記，天頭、欄外有朱筆、墨筆校訂。書後又附校記若干頁，乃當時未能刊刻之札記<sup>37</sup>。觀海堂本完整保留了舊鈔本除卷八以外的三處識語，卷六識語無“書寫畢”三字，卷六、七、十一內題「玉燭寶典」下多一“記”字，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殘缺，卷六題下誤入“貞和三年/十一月”七字，同時卷二末尾有依田利用諸人識語，可知此本出自佐伯本系統下昌平鬻本子系統無疑<sup>38</sup>，大概便是森氏根據楳齋校本為楊守敬所作新鈔本。值得一提的是，觀海堂本闕失卷八末尾舊鈔本識語、卷十二末尾依田利用諸人識語這一特徵，與森氏本如出一轍，二本或許便是源自楳齋校本的同胞兄弟<sup>39</sup>。

由於森氏在新作鈔本之時，將楳齋根據原本校對的部分徑直寫入原文，那麼觀海堂本正文部分理應與昌平鬻本正文一致。僅以依田利用諸人在昌平鬻本序文所出校記部分文字為例，可以發現觀海堂本確實保留了一些昌平鬻本正文疑似誤字的部分，然而也存在大量改換舊文的情況，如：

昌平鬻本“布攻” 校記：“政”

觀海堂本“布政”

昌平鬻本“高湯” 校記：“商”

觀海堂本“商湯”

昌平鬻本“以官箴” 校記：“箴”

觀海堂本“以官箴”

<sup>36</sup>也有學者認為這張附箋僅僅表明楊守敬借書之意，並非真正將某本借出，可備一說。參見馬月華《古逸叢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01。

<sup>37</sup>《鄰蘇老人年譜》，《楊守敬集》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癸未，四十五歲」條：“故《叢書》，如《玉燭寶典》、正平《論語》、《史畧》諸書均有笱記，皆輟不刻，至今尚存守敬篋中”。

<sup>38</sup>阿部隆一以為摹寫自尊經閣本（《中國訪書志（增訂版）》，汲古書院，1983年，頁83），誤。

<sup>39</sup>上述南葵甲本也具有同一特徵，不知是否同樣出自楳齋校本。

昌平黻本“羸劉” 校記：“羸”  
觀海堂本“羸劉”  
昌平黻本“森罪區別” 校記：“羅”  
觀海堂本“森羅區別”  
昌平黻本“棄周書序” 校記：“棄恐案字”  
觀海堂本“案周書序”

而保留昌平黻本誤字的部分，也往往以朱筆註明當作某字，其內容與依田利用諸人校記大致相同。同時，觀海堂本部分校記似乎是針對昌平黻本校記而發，如序文“下苞赤縣”句，昌平黻本校記作“苞恐包字”，觀海堂本校記作“古書包與苞通”；“序說日”句，昌平黻本校記作“日恐曰字”，觀海堂本校記作“日是曰誤”。不知是否掖齋書朱之時，摻雜入了昌平黻本原有校記。由於掖齋校本已不存於世，無法確切了解其在昌平黻本與觀海堂本之間究竟扮演了怎樣的過渡角色，然而觀海堂本源出自佐伯本、昌平黻本一系則無可置疑。

由於觀海堂本與《古逸叢書》本行款相同，字體、筆畫相近，自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以來，學者大多判斷其便是《古逸叢書》本所用底本<sup>40</sup>。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竟然完整保留了尊經閣本所獨有，而自佐伯本以來所關失的卷十二「史記曆」以下文本。這部分文本不見於幕末時期流傳的眾多鈔本，楊守敬究竟是從何獲得，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幸運的是，在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所藏《古逸叢書》之中，正隱藏著解開這一謎題的鑰匙。眾所周知，《古逸叢書》在日本印行以後，黎庶昌將其分贈日本各界知名人士<sup>41</sup>，森立之所獲一部即歸於斯道文庫。其中《玉燭寶典》一種除印行本外，又有校正刷四冊（以下簡稱「楊氏校正本」），保留了《古逸叢書》上版之前的校正痕跡<sup>42</sup>。

作為正式版行之前的校稿，楊氏校正本在版本系統中位處觀海堂本與《古逸叢書》本之間。相較於觀海堂本，楊氏校正本的修訂之處包括：舊鈔本識語、依田利用諸人識語的留存情況同於觀海堂本，然而卷二末尾所有識語不知何故被移入卷三末尾；卷六、七、十一內題無“記”字；卷六題下未誤入“貞和三年/十一月”七字。第一點當是手民之誤，後兩點則大概是出於統一格式的需要而有意刪落。無論如何，這三處變動均為《古逸叢書》本所沿襲。楊氏校正本又有大量朱墨校記，與觀海堂

<sup>40</sup>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增訂版）》，頁 83。《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故宮博物院，1983 年，頁 399。馬月華《古逸叢書研究》，頁 103。

<sup>41</sup>《鄰蘇老人年譜》「癸未，四十五歲」條：“《古逸叢書》已成，督印百部，黎公以贈當時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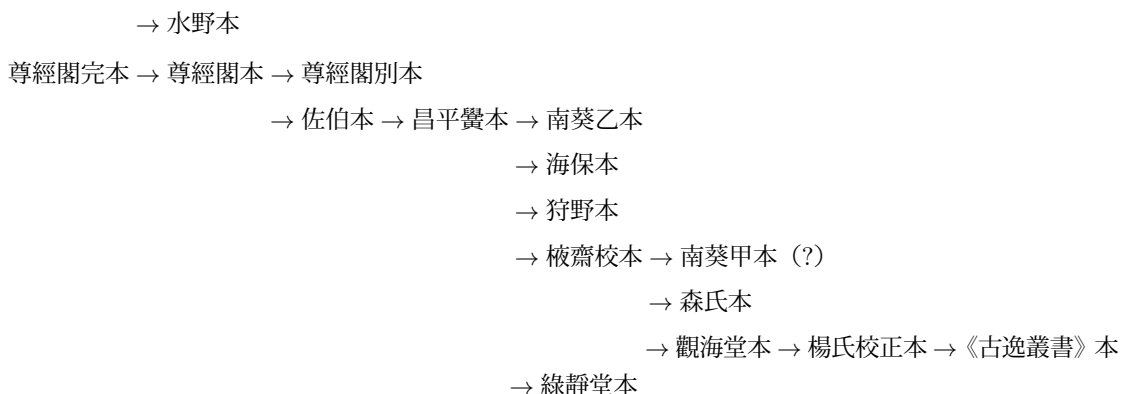
<sup>42</sup>參見高橋智《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楊守敬觀海堂舊藏室町時代鈔本「論語集解」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第 41 輯，2007 年，頁 126。後收入《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の研究》（汲古書院，2008 年）。

本所附「札記」頗近似。

需要強調的是，楊氏校正本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同樣殘缺，也就是說，直至《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校正階段，楊守敬都未能一睹尊經閣本真容。然而楊氏校正本留下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經籍訪古志》初稿本及前引《解題叢書》本《經籍訪古志》皆云“聞加賀侯家藏卷子足本，未見”；而楊氏校正本及《古逸叢書》本所錄，則作（佐伯本）「從加賀侯家藏卷子本鈔出」。《經籍訪古志》初稿本完成於安政二年（1855）；楊氏校正本及《古逸叢書》本保留的文本，或許便是森立之在初稿本基礎上新作修訂而成。頗懷疑森立之當時已有幸得睹尊經閣本原貌，因而下此判斷。與此猜測相證成，在楊氏校正本卷五“明眾類竝為害也”天頭處，居然正有一處朱筆校記“加賀本眾類倒”，而尊經閣本此處確作“明類眾竝為害也”。楊氏校正本所無、《古逸叢書》本所有的卷十二自「史記曆」以下文本，無疑也是來自尊經閣本。

森立之、楊守敬究竟是通過怎樣的因緣獲睹尊經閣本《玉燭寶典》，既不見於《古逸叢書》本跋文，亦不見於楊守敬本人著述之中。然而，在橋川時雄自北京書肆搜羅而來的楊守敬手批本《經籍訪古志》「玉燭寶典」條下，恰好留有一條極為珍貴的批語，作：“加賀侯藏本。余曾見于重野安繹家。亦闕第九卷。”<sup>43</sup>重野安繹乃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與包括楊守敬在內的清國名士多有交遊。其在參與國史編纂期間，曾自尊經閣文庫發掘竝影印《十二月消息》《垂髮往來》之類珍貴典籍<sup>44</sup>。尊經閣本《玉燭寶典》或許便是在重野安繹蒐集史料之時偶然暫留彼處，竝為楊守敬所見。當時或許無暇大量訂正現存版片，故而匆匆增補了最為關鍵的闕文部分。此後幾十年間時移世易，尊經閣本再次重現於世人面前，則已是日本戰敗前夕的昭和十八年了。

#### 《玉燭寶典》鈔本流傳系統圖



<sup>43</sup>轉錄自長澤規矩也《楊惺吾日本訪書考》，《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2卷，汲古書院，1985年，頁245。

<sup>44</sup>石川謙、石川松太郎編《日本教科書大系·往來編》第1卷《解題》，講談社，1968年，頁29。

### 《玉燭寶典》流傳年表

嘉保三年 (1096)	平安時代舊鈔本完成。
貞和五年 (1349)	二階堂道本據平安時代舊鈔本鈔寫一部，即尊經閣完本。
正平七年 (1352)	足利直義敗於觀應之亂，不久幽閉而死。其後，尊經閣本「面山叟」識語爲人所割裂，即現存尊經閣本。
寬政十一年 (1799)	《佚存叢書》刊刻開始。
享和元年 (1801)	佐伯藩主毛利高標去世。其在世或稍晚，佐伯文庫入藏一尊經閣本傳鈔本，即佐伯本。
文化二年 (1805)	昌平坂學問所諸儒官接受林述齋任命，據佐伯本鈔寫一部竝校訂，即昌平覺本。依田利用竝據校訂成果完成《玉燭寶典攷證》。
文化七年 (1810)	《佚存叢書》刊刻結束。
文化十年 (1813)	增島蘭園據昌平覺本鈔寫《玉燭寶典》一部，後爲杉原心齋所得，即綠靜堂本。
文政十一年 (1828)	佐伯藩主毛利高翰將包括佐伯本在內的大量珍籍古本進獻幕府。
天保十年 (1839)	松崎慊堂整理狩谷掖齋舊藏，其中有據昌平覺本鈔寫《玉燭寶典》一部，即掖齋校本。
安政二年 (1855)	《經籍訪古志》初稿本完成。
安政三年 (1856)	森立之、約之父子校訂《玉燭寶典》鈔本，即森氏本。
安政五年 (1858)	小梅里草澤源良據掖齋校本鈔寫《玉燭寶典》一部，即南葵甲本。
明治十四年 (1881)	楊守敬拜訪森立之，囑託其據掖齋校本抄錄一本以作爲《古逸叢書》之底本，即觀海堂本。
明治十七年 (1884)	黎庶昌於東京督印《古逸叢書》百部竝分贈日本各界知名人士，森立之所獲一部有《玉燭寶典》校正刷四冊，即楊氏校正本。
昭和十八年 (1943)	《尊經閣叢刊》本《玉燭寶典》印行。

(作者爲御茶水女子大學基幹研究院助教)